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1.015

唐太宗安边政策与治理模式述论

——以处理与东突厥、薛延陀政权关系为例

冯雨晴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贞观年间,为解决北疆边患,唐太宗实行了新的安边政策和治理模式。第一,打破传统边防观念,不筑长城,以攻为守,化域外为辖地,改变了唐朝北疆的民族分布格局。第二,废止册立可汗,改置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对北方游牧民族实行羁縻统治,改变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性质。第三,创设燕然都护府,以都护府管辖羁縻府州,改变了前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

[关键词]唐太宗;安边政策;治理模式;羁縻府州;燕然都护府

[中图分类号]K242;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9)01-0094-05

统一王朝建立后,如何处理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关系,维护边疆安定,是各朝代都面临的问题,唐王朝也不例外。突厥与薛延陀是唐前期强大的北方民族,先后建立了游牧政权,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唐太宗实施新的安边政策和治理模式,不筑长城,以攻为守,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政权后,设置羁縻府州与燕然都护府加以管理,成功解决了唐朝前期的北疆边患。

学术界有关唐太宗安边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①,但多着眼于有唐一代,且重点在羁縻府州与都护府制度,缺乏与秦、汉及隋朝北疆政策的纵向比较研究视野,对唐太宗安边政策上的创新性重视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唐太宗安边政策及其治理模式与前代的显著不同予以讨论。

一、不筑长城,化塞外为辖地

唐朝建立,正值突厥势力强盛。东突厥政权连年发兵,侵扰唐朝北部边地,成为唐北方边境的主要威胁。唐太宗登基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一度进兵至唐都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之北。虽然最后双方议和,但更使李世民认识到解决突厥侵逼问题的紧迫和必要。采取何种安边政策摆在了唐朝君臣面

^① 代表性的论著有: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论述了唐对东突厥的战争及战后安置;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详细探讨了唐初不筑长城的原由,强调唐的战略攻势与太宗兼并游牧社会之意图;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指出了唐朝不筑长城的几点原由,其一是唐太宗“以攻为守”的边防策略;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系统地研究了羁縻府州制度的各个方面;樊文礼《唐代羁縻府州的类别划分及其与藩属国的区别》(《唐史论丛》第8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指出了唐代羁縻府州与藩属国的区别,认为两者有较大不同;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探讨了自西汉都护至唐代都护府的制度发展,全面详实。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汉唐时期制度构建与国家治理”(编号:IFYT1703)。

[收稿日期]2018-01-11

[作者简介]冯雨晴,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前。贞观二年(628)九月,唐朝君臣针对突厥给北方边郡造成的巨大压力举行廷议,一部分朝臣提出“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1](卷193P.6169),建议加筑修缮前代长城,以兵民戍边之策来应对。

依据地形险要修筑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加强对北方边疆地区统治的主要措施之一。《新唐书·突厥传》云:“《易》称:‘王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修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备胡,燕、秦亦筑长城限中外。”^[2](卷215《突厥传上》P.6023) 战国时期北方秦、赵、燕三国均曾筑长城、置郡县以防御北方民族。秦、西汉与隋朝都是定都关中的大一统王朝,为保卫北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也都曾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卷88《蒙恬列传》PP.2565~2566)。修筑长城后,秦朝占据阴山以南地带,并将大军屯于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防御效果显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弯弓而报怨”^[3](卷6《秦始皇本纪》P.280)。西汉武帝取得河南地之战胜利后,“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3](卷110《匈奴列传》P.2906),“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4](卷94《匈奴传》P.3784)。隋朝也修筑长城,防御突厥。隋文帝开皇初,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南出勃岭,绵亘七百里。^[5](卷900《外臣部·备御第三》P.11631)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据榆林,东至紫河。^[5](卷900《外臣部·备御第三》P.11632) 大业四年(608),又修筑了自榆谷向东的长城。^[5](卷900《外臣部·备御第三》P.11633)

正是借鉴前代做法,朝臣们提出修筑长城、屯兵防御突厥的建议。对此,唐太宗明确表示反对:“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1](卷193P.6169) 他认为突厥自然灾害频仍、社会动乱,政权面临危机,因而可以通过武力解决东突厥威胁。应当说,唐太宗准确把握了当时东突厥政权内外交困、势力衰弱的实际情况。其时,突厥颉利可汗重用唐人赵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复,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1](卷192PP.6149~6150)。颉利可汗信任唐人赵德言和西域胡人,疏远同族人,改变游牧社会一些旧有制

度习俗,采取苛税重赋,又连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加之遭遇严重的雪灾,致使内外离心,内部动乱,属部纷纷脱离,实力大为削弱。这客观上给了唐太宗解决突厥问题的一个绝佳机遇。唐朝抓住时机,连续出兵攻击东突厥。贞观三年八月,唐太宗以颉利可汗背信援助梁师都为由,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伐东突厥。^[6](卷194《突厥传上》P.5159) 十一月,又兵分四路,“众合十余万,皆受李勣节度,分道出击突厥”^[1](卷193P.6178)。贞观四年(630)春正月,唐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蜈蚣坝)大胜突厥。二月,“(李)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迭罗施。颉利帅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勣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勣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1](卷193PP.6184~6185)。三月“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掠罗(即苏尼失,牙直灵州西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1](卷193P.6186)。唐朝的连续用兵,使东突厥损失大量人口财富,遭到沉重打击,贞观四年三月,颉利可汗最终也被俘获解送至唐都长安。至此,东突厥政权灭亡。

东突厥政权灭亡后,漠北代之而起的是薛延陀汗国。薛延陀是铁勒的一支,曾依附于东突厥。贞观二年,唐太宗曾拜其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入贡。^[1](卷193P.6173) 东突厥政权灭亡后,薛延陀称雄于漠北,真珠毗伽可汗向唐请求和亲,希望以此扩大自身影响,成为漠北之主。^[1](卷197P.6313) 针对薛延陀的和亲请求,唐太宗召集朝臣讨论对策。房玄龄提出:“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1](卷196P.6293) 褚遂良也赞同和亲,认为“龙沙以北,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1](卷197P.6314)。房、褚等朝臣们的意见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原王朝和亲羁縻的边防观和安边政策。但唐太宗认为只有在中原王朝强盛的前提下,和亲才可以保障北境安宁,而“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1](卷197P.6314),因此,和亲不是安边的长久之法。他反对和亲,主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来自薛延陀的威胁,巩固边疆。显然,唐太宗的安边主张和策略是对秦汉以来以守为主,筑长城防御、联和亲羁縻的传统边防观和安边策略的突破。

策略既定,只等时机。贞观十九年(645),薛延陀引兵寇河南,唐太宗派遣大军合兵出击,大败薛延陀。^[1](卷198P.6345)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又派军“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1](卷198P.6350),取得大胜。

薛延陀“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1]（卷198P.6350）。薛延陀政权灭亡，唐朝尽有漠北之地。

唐太宗为何不效仿前朝修筑长城以防御东突厥？学界讨论过这一问题。李鸿宾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唐朝并不甘心维持南北对峙，想要采取战略攻势，达到兼并游牧社会的意图。^[7]穆渭生总结了五点原因，其一为在国防战略思想上，唐前期的边防策略是“以攻为守”的进取态势。^[8]（PP.122~125）的确，修长城的本质是被动的防御，而唐太宗的战略属于主动的进攻，其不筑长城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无论秦始皇还是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实力都要强于游牧民族，然而中原大军虽将匈奴赶出了河南之地，但他们的安边政策仍是防御，即修筑长城，守住阴山防线。《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了主父偃的一段话：“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3]（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P.2954）此话反映了中原王朝的传统边防观，即认为匈奴等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军事征服不仅难以进行，而且“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弊端大于所得，并非安边良策。长久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沿袭这一观念，将修筑长城作为安边的首选策略，秦、汉王朝乃至隋朝都无不如此。正如西汉孝文帝遗书匈奴时所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3]（卷110《匈奴列传》P.2902）以长城为界，南北分治，这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关系的基本写照。

唐太宗不筑长城，通过“扫清沙漠”实施“以攻为守”的边防策略，武力击溃东突厥和薛延陀政权，设治漠北，化塞外为辖地，从根本上解决了边防困境。这不仅是对中原王朝传统边防观的颠覆，也是对前代王朝安边政策的超越。

二、废止册立可汗，改置羁縻府州

东突厥政权灭亡后，“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1]（卷193P.6187）。如何安置突厥降户，唐太宗下令朝臣讨论方案。大臣们的意见主要有三种。其一，主张将突厥降户全部迁徙内地，分散安置，逐步变成编户齐民，“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

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1]（卷193P.6187）。这是多数大臣的意见。其二，建议将突厥降户安置在黄河以北的塞外地区，通过分封等羁縻手段加以管理。如中书侍郎颜师古言：“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1]（卷193P.6187）秘书监魏徵也认为：“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1]（卷193P.6188）其三，将突厥降户安置在传统的塞下地区，因俗而治。这是中书令温彦博的主张。他指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1]（卷193P.6188）

唐太宗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并结合众人主张，“于朔方之地，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颍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9]（卷197《突厥上》P.5415）。突厥“其余酋长至者，皆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1]（卷193P.6189）。这些新置都督府的都督均由唐朝任命任命的突厥降部首领充任。据《通典》载，贞观四年，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实封七百户，以其下兵众置顺州都督府，仍拜为顺州都督，遣率部落还蕃”^[9]（卷197《突厥上》P.5412）。同年，以阿史那思摩“拜右武侯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颍利旧众”^[9]（卷197《突厥上》P.5412）。《资治通鉴》亦有相关记载。^①

唐太宗之所以不循旧例，废止册立突厥首领为可汗，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以突厥首领为朝廷命官，正是借鉴了前朝经验。唐太宗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后说：“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1]（卷193P.6189）对于归附的游牧部落首领，西汉、隋朝均采取沿用游牧社会对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进行册封，设置藩属国，依游牧故俗进行羁縻的政策。西汉接纳匈奴降部，册立呼韩邪为单于，确立双方宗主与藩属关系，并以呼韩邪部防御北匈奴侵扰。隋朝册立归附的突厥染干可汗为“意大利豆启民可汗”，将其部落迁至河南之地，启民可汗以藩属自居。^[10]（卷49《北狄传》P.1873）藩属关系下中原王朝对独立

① 《资治通鉴》卷193载，贞观四年（630）五月，唐太宗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以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

的游牧政权的制约是十分有限的。唐太宗不再册立东突厥首领为可汗,而是设置羁縻府州,任命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改变了隋朝以来东突厥的藩属国性质和地位,使突厥都督等各级贵族成为朝廷命官,普通部众则是唐朝治下的臣民,均“宜善守中国法”,尽各项义务。樊文礼曾深入比较了唐代的羁縻府州与藩属国,指出二者在制度上有明显区别:第一,羁縻府州按规定要负担一定赋税,而藩属国没有赋税;第二,羁縻府州有义务服从唐朝廷调发,藩属国则没有此义务;第三,羁縻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而藩属国则不是;第四,唐朝对羁縻府州都督的任命与对藩属国国王、可汗的册封性质不同。^{[5](PP. 83~92)} 羁縻府州与藩属国的诸多区别,显示了唐太宗废止册立可汗、改置羁縻府州这一安边政策的突出创新性。

自贞观四年唐太宗创制并成功实践羁縻府州后,该制度成为唐朝在周边民族活动区广泛推广沿用的重要制度。《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总结道:“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边疆羁縻府州数量众多,“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2](卷43《地理志七下》)PP. 1119~1120)}。可见,唐太宗废止册立可汗、以羁縻府州取代藩属国的安边政策,根本上改变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性质,巩固了北部边疆。

三、创设燕然都护府,创新边疆治理模式

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消灭薛延陀政权后,在漠北铁勒诸部居地设置羁縻府州,“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霄为真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1](卷198PP. 6357~6358)}。共设六府、七州,府设都督,州置刺史。因这些羁縻府州距离唐朝本土很远,朝廷机构不便统辖,唐太宗遂就近创

设了燕然都护府予以管理。《新唐书·回鹘传》载:“(太宗)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六都督、七州皆隶属,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2](卷217《回鹘传上》)P. 6112)}

“都护”与“都护府”,已见于前代。最早西汉曾设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4](卷19《百官公卿表》)P. 738)}。唐太宗也曾西域设置都护府,贞观十四年(640)八月讨平高昌后,九月“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1](卷195P. 6269)}。与西汉西域都护和贞观十四年所设安西都护府相比,贞观二十一年设置的燕然都护府有其创新之处。

首先,在都督府、刺史州上设置都护府,以燕然都护府管理六都督府、七刺史州为唐太宗开创之举。西汉西域都护之下不设羁縻府州。贞观十四年设置的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西域之地,但当时其下并没有设置羁縻府州。安西都护府管理羁縻府州是到后来高宗时才开始的。显庆二年(657),唐朝夺得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地,以“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1](卷73《安西都护府》)P. 1567)}。《新唐书·地理志》亦载:“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龙朔元年(661),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国疾陵城置,右隶安西都护府。”^{[2](卷43《地理志七下》)PP. 1135~1136)} 高宗设羁縻府州,并隶安西都护府,才形成安西都护府管辖羁縻府州的制度,在时间上比贞观二十一年所设燕然都护府管理六府七州晚了10年,实际上是唐太宗以都护府管理都督府、刺史州制度的延续。

其次,燕然都护府的职能偏向行政,而西汉西域都护与唐安西都护府的职能偏向军事。据《汉书》载,西汉西域都护的职权很大,“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4](卷96《西域传上》)P. 3874)}。而西域都护陈汤可以不经朝廷,“矫制”发兵击杀匈奴郅支单于^{[4](卷70《陈汤传》)PP. 3010~3013)},可见西汉的西域都护兼有军政职能,且军事职能更强。贞观十四年所设安西都护府的职能与西汉都护职能类似,设置时,便“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2](卷221《西域传》)P. 6222)},也是偏向军事职能。吴玉贵称唐朝在军事势力实际到达的地区实行都护统治,并由安西都护府派遣戍兵驻守^[12],薛宗正亦称安西都护府为军府^{[13](P. 45)},强调

的都是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职能。事实上,安西都护府设置之时,唐与西突厥激烈争夺西域,安西都护府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贞观二十一年的燕然都护府则为管理羁縻府州而置,当时漠北环境相对平和,这也决定燕然都护府的职能偏向行政而非军事。其主要职能,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唐太宗“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6](卷195《回纥传》P.5196)。“以导宾贡”,指的是导引经“参天可汗道”来往内地的游牧民族使臣及进献物品,显然这是行政职能而不是军事职能。《资治通鉴》亦载:“(太宗)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1](卷198P.6359)李素立安抚诸部,维系唐朝统治,行使的也主要是行政职能。

燕然都护府设置后第三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死,高宗即位。高宗时期,以都护府管理羁縻府州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北疆都护府数量增多。根据史料记载及学者研究,永徽元年(650)增置瀚海都护府^①,“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1](卷199P.6385)。这一时期,北疆燕然、瀚海二都护府不断调整。龙朔三年(663)二月,燕然都护府徙至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府^[1](卷201P.6447),总章二年(669)又改名安北都护府^[1](卷201P.6474)。原永徽元年(650)所置瀚海都护府于龙朔三年二月徙云中,更名云中都护府^[1](卷201P.6447),麟德元年(664)正月改名单于大都护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1](卷201P.6453)。安北都护府与单于都护府成为唐朝管理北疆的主要机构^[6](P.127),二者辖境以碛为界,碛北州府隶属安北,碛南隶单于。

第二,北疆都护府辖境扩大。贞观二十一年的燕然都护府只管辖漠北偏远的羁縻府州,至高宗时期,漠南羁縻府州也开始归于都护府管辖。永徽元年九月,唐高宗以新置瀚海都护府(即后来的单于都护府)管辖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十一州。^[1](卷199P.6385)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皆是以突厥降户所置的漠南羁縻府州。

第三,早期的燕然都护府偏重行政管理职能,军事职能不强;后随着一些游牧部落反唐叛乱的出现,北疆都护府军事职能增强。贞观二十二年(648)时,燕然副都护元礼臣诛杀反叛的回纥首领还需要依靠计谋。至高宗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

德温傅、奉职二部叛乱,唐高宗“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1](卷202P.6507)。辖境内发生叛乱,高宗令单于都护府讨伐,可见单于都护府行使军事职能已为常事。

总之,自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创设燕然都护府管理羁縻府州后,都护府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北疆都护府数量增多,辖境扩大,军事职能增强。高宗时期,唐太宗开创的以都护府管理羁縻府州制度全面成熟,改变了之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J].民族研究,2015,(3).
- [8]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 [9]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0]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1]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2]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J].新疆大学学报,1986,(1).
- [13]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于默颖)

① 岑仲勉与樊文礼皆认为,“永徽元年置单于、瀚海二都督府”中的“单于”应为“瀚海”,“瀚海”为“燕然”,参见樊文礼《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